

萬念歸目清涼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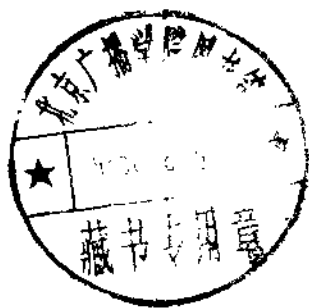
延安時期新聞出版文史資料 第一輯

延安清涼山新聞出版革命紀念館

萬象歸目清涼山

延安时期新闻出版文史资料

(第一輯)



延安清涼山新聞出版革命紀念館

一九八六年十月

目 录

祝贺与感谢.....	师银笙 (1)
------------	---------

一

新华社的初创时期.....	向仲华 (3)
清凉山怀旧.....	吴文杰 (9)
延安初期记者生活片断.....	缪海棧 (20)
抗日战争初期的新华社.....	叶蠖生 (38)
从开创到成长.....	陈 龙 (44)
回首话当年.....	胡韦德 (57)
延安的怀念.....	刘秀兰 (68)
回顾延安清凉山的战斗岁月.....	彭志义 (76)
看看今天,想想过去.....	孟自成 (82)
艰难的岁月.....	王宁祥 (92)
清凉山的回忆.....	苗植田 (98)
延安清凉山点滴.....	王 杰 (104)

二

关于延安《解放日报》改版.....	陆定一 (108)
我在清凉山上的新闻工作.....	高扬文 (115)
走在世界舆论的前面.....	王 揖 (127)
端正思想方法的起点.....	丁济沧 (135)
清凉山上一株松.....	杨永直 (138)
清凉山杂忆.....	张 沛 (144)

八月十日后的几天·····	张映吾 (153)
光生同志二三事·····	刘卓云 (156)
清凉山的记者生涯·····	田 方 (160)
忘不了你哟, 清凉山·····	高向明 (172)
在清凉山的前后·····	冯森龄 (178)
办一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	胡绩伟 (187)
散记延安九年·····	谭 吐 (212)
怀念清凉山·····	午 人 (217)
啊! 清凉山·····	汤 洛 (221)
清凉山培育我成长·····	陈林彬 (227)
我的成长和回顾·····	刘星全 (233)
清凉山生活漫忆·····	翟 准 (235)
向西安进军·····	张思俊 (240)
一个新兵的感受·····	袁 塔 (242)

三

筹建新华广播电台的最初日子·····	阙 明 (246)
第一座红色广播电台·····	傅英豪 (252)
无线电广播史上的奇迹·····	苟在尚 (259)
听到我们自己的广播了·····	丁 戈 (267)
重返延安忆当年·····	徐瑞璋 (273)
延安广播的萌芽时期·····	王唯真 (275)
延安播音生活回忆·····	肖 岩 (281)
回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韦君宜 (285)
我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播音的时候·····	孟启予 (290)
忆清凉山的战斗岁月·····	温济泽 (294)
“XNCR”, 我想念你·····	王 恂 (302)
陕北战争期间播音工作的片断回忆·····	钱家楠 (307)

在战斗的岗位上·····	杨慧琳 (316)
沿着历史的道路·····	杨兆麟 (320)
西北新华广播电台开创的时候·····	武 英 (335)

四

关于中央出版发行部历史的回忆

·····	王 林 (338)
黎明前的号角·····	苏 生 (342)
清凉山——传播马列主义思想的基地	
·····	孙 萍 程 成 (346)
难忘的清凉山岁月·····	程海洲 (349)
忆建立出版发行网点的经过·····	许光庭 (370)
新华书店在延安初创时期·····	周保昌 (374)
对清凉山的美好回忆·····	李 奇 (382)
延安时期出版发行工作情况·····	刘思让 (385)
粗浅的回忆·····	张若平 (391)
回忆延安的生活·····	杨 申 彭世钦 (394)
艰苦·幸福·理想·····	张凤翥 (400)
艰苦奋斗·····	梁云庵 (404)
“我是电话员”·····	谢 明 (407)

五

回忆延安中央印刷厂的历史简况·····	李 平 (409)
对延安中央印刷厂的回忆和怀念·····	李长彬 (418)
保卫工厂，保卫陕甘宁·····	万启盈 (427)
土油墨诞生记·····	雷达天 (442)
我的老蔡师傅·····	惠泽民 (444)
在延安清凉山的奋斗岁月·····	沈 泉 (451)

我的回忆·····	樊允行 (457)
延安清凉山生活片断·····	武志善 (462)
渡过困难的四年·····	赵永泰 (476)
漫忆清凉山·····	米健生 (478)
难忘的两件事·····	任 楚 (481)
我们印刷厂的工作和生活·····	石 夫 (484)
难忘的清凉山·····	裴汉君 (487)
清凉山纪事·····	刘立夫 (504)
闪耀着光芒的青春·····	张志仁 (513)
中央印刷厂的思想政治工作·····	刘本立 (517)
回忆清凉山·····	武占发 (521)
中央印刷厂的创建初期·····	王 钊 (525)
简单的回忆·····	胡 杰 (532)
在延安清凉山的时候·····	李凤莲 (535)
幸福的回忆·····	张夫生 (538)
暮年的回忆与反省·····	高 原 (545)
清凉山上的京胡声·····	丁 锐 (548)
万佛洞里的切书机·····	曹国兴 (552)
我们的刻字部·····	贾 夫 (556)
艰苦创业百战多·····	刘文泉 (566)
他就是咱们的总司令·····	高玉清 (569)
“毛主席来了”·····	马昭言 (573)
在清凉山的岁月里·····	张永胜 (575)
几件往事·····	鲁俊敏 (578)
中央印刷厂发行工作的回忆·····	朱贤忠 (584)
摇马达·····	刘汉义 (589)
延安中央印刷厂人员通讯录·····	张彦平 (591)
后 记	

祝 贺 与 感 谢

延安报社总编辑 师银笙

延安清凉山新闻出版革命纪念馆正式开馆了。与此同时，《万众瞩目清凉山》也与大家见面了。这是新闻出版界的一件大喜事，也是延安人民的一件大喜事，可喜可贺！

清凉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是中央党报委员会、新华通讯社、解放日报社、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中央出版发行部、中央印刷厂和边区群众报社、西北新华广播电台的所在地。当年，他们在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直接领导下，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为发展党的无产阶级新闻出版事业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同时，也为新一代新闻出版工作者培育了优良的工作作风，也可称“清凉山作风”。这是党的宝贵财富，是新闻出版界的传家宝。因此，恢复清凉山革命旧址，宣传清凉山的精神和征集延安时期新闻出版工作的文史资料，既是对青年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需要，也是当前进行新闻出版工作改革的需要。

从一九七〇年起，延安地委曾两次派员到北京汇报恢复清凉山旧址的有关事宜，都因林彪、“四人帮”的干扰，未能如愿。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我社受地委委托，第三次上京汇报，受到中宣部的重视和支持。郁文同志为此作了重要批示，陆定一同志题写了纪念馆的馆名，并很快成立了以王揖同志为组长、王子野

同志为副组长的延安清凉山新闻出版革命纪念馆筹建领导小组。许多新闻出版单位，闻风而动，解囊相助，给予热情支援。新华社、广播电视部各赞助三十万元，国家出版局赞助二十万元；人民日报社、北京外文印刷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广播学院、四川万县日报社，以及全国其它新闻出版单位，也都给予了大力支援。值此开馆之际，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清凉山上，革命的老一辈曾洒下了辛勤的汗水。艰苦的斗争生活磨练出一代坚强的新闻出版战士，他们现在都成为这条战线上的中坚。为了使前辈们开创的业绩发扬光大，使清凉山作风代代相传，我们受领导小组委托，确定编辑清凉山的回忆录——《万众瞩目清凉山》。消息传出，许多老同志奔走相告，纷纷挥毫，不顾炎夏酷暑，写下了感人肺腑的篇章，生动地再现了当年清凉山如火如荼的生活。我们相信，她将成为传统教育的珍贵教材，激励人们沿着先辈的足迹开拓向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新华社的初创时期

向仲华



作者简介：向仲华，男，湖南溆浦县人，一九一一年生。一九二七年初参加我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同年三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〇年七月参加红军，同年九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师政治部秘书长、团政治处主任。参加过长征。一九三六年春起，历任《红色中华》报社长、《新中华报》社长、新华社社长。一九四二年初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旅副政委、纵队政委、军政委、兵团政治部主任等职。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部队政委、副总参谋长、广州部队政委、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一九八一年五月逝世。

新华社的同志要我写一篇关于新华通讯社初创时期历史情况的文章，我自然无法推托，也不应推托，因为我是参加过新华通讯社组建工作的，而且也可以说是主要的一个人。但时隔多年，有些事情已经想不起来了。可是，重大的事情还是记得的，现在写出来供同志们参考。

一九三六年初，我调到红中社（红色中华社）接替任质斌同

志的工作，编油印的《红色中华》报。当时，红中社与《红色中华》报是同一个组织机构，地址在陕北瓦窑堡。由于人员很少，经常是白天采访搜集材料，晚上编写刻印，比较紧张。这年七月初，党中央从瓦窑堡迁往保安县（后改称志丹县），红中社也随同迁往保安。到了冬天，也就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廖承志同志到保安，参加红中社的工作。当时由博古同志主持，召开了红中社工作会议，决定由廖承志负责国外电讯部分（翻译全部外电），由我负责国内报道（每天发两千字的电讯），同时负责编辑《红色中华》报。还有一个李柱南同志，负责中文译电。西安事变发生后，为了和平解决这次事变，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抵达西安，红中社西安分社随即成立，向西安各报社和社会团体印发西安红军办事处抄收的红中社新闻和我党文告、宣言等。西安分社的领导人是李一氓同志。

一九三七年一月，党中央由保安县迁到延安，红中社也随之迁到延安城内。这时，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内和平已开始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很大的发展。为了便于党中央及时指导国内人民巩固和平的斗争，扩大陕甘宁苏区（“七·七事变”后改为陕甘宁边区）对全中国人民的影响，党中央决定将《红色中华》报改名为《新中华报》，红色中华社改名为新中华社，简称新华社。当时中央是博古同志分工领导红中社工作。我记得报纸和通讯社改名的事，是博古口头传达的，中央没有发文件。

红中社改名新华社不久，三月间，廖承志同志奉调去筹备出版《解放》周刊。他走后，沙可夫同志参加新华社的领导工作。一九三八年四月，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沙可夫调去当副院长，我除主编报纸外，又负责新华社的工作。

在改名《新中华报》之前，《红色中华》报的国际国内新闻来源，是靠抄收当时国民党中央社的部分新闻电讯（后来抄收全

部），其中一部分重要新闻刊载报端，另一部分则印成《参考消息》（后改为《今日新闻》），供中央及党政军民各单位参考。改名为《新中华报》以后，除抄收中央社的全部电讯，并增抄日本同盟社的消息（当时已有日语翻译）。一九三七年一月开始用新华社名义，向国内各进步团体、地下党组织及统一战线组织发布国际国内的重要新闻，而以介绍苏区工作建设的新闻为主，其数量约占整个新闻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

随着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成，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新华社的业务也逐渐扩大起来了。不仅发布的新闻数量增大（由原来每天1500字左右增至4000—5000字），而且也经常发布党中央的重要指示、决定和《新中华报》、《解放》周刊的社论，以指导和推动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抄收各国通讯社电讯的范围也随之扩大了。德国海通社、英国路透社、法国哈瓦斯社、美国国际新闻社、苏联塔斯社等通讯社的电讯，我们已经抄收并翻译了。这些消息经过我们编写、播发，较迅速地反映了国际上政治、军事斗争情况，使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人民能够较快地从更多方面了解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及其发展，这对被封锁的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是有很大参考价值的。当时，新华社已开始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分社组织，在陕甘宁边区各地也组织了若干通讯网。

创立伊始，《新中华报》与新华通讯社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即在一个组织内，分担两种不同的业务，既出版报纸，又发布新闻。因此，也可以说是一种联合组织形式。随着中国革命事业的不断发展，这样的组织形式，已经担负不了新的历史任务。鉴于这种情况，一九三九年初，党中央决定新华通讯社脱离《新中华报》，单独成立组织机构，直接归中央党报委员会管理。这时，新华社的组织也略具雏型，不仅有翻译部门，而且有了自己的编辑采访部门，有自己的通讯记者网和分社组织，也有

能保证需要的印刷机构。它的业务，除收集和发布人民所需要的新闻，起党中央的喉舌作用外，对于国内的重大事件（如汪精卫投敌、皖南事变及国民党发动的各次反共高潮等），都能及时地、经常地反映各界舆论。有时还担负党报的评论工作，成为党中央指导全国人民抗日斗争的重要工具。与此同时，对于国外报道的工作也加强了。我们用电讯或通讯稿的形式，给莫斯科对外新闻社提供有关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具体材料，这对促进国际进步人士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了解，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一九四〇年三月，周恩来同志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带回一部广播发射机。中央发出了建立延安广播电台的指示。于是，在延安城西北的王皮湾村山沟的窑洞里，建立起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这是我党第一个口语广播台，也是新华社第一次用口语发布新闻。当时的条件真是简陋极了，为了隔音防潮，只好在窑洞四面墙上挂上粗毛毯子；没有唱片，常常由播音员唱一支革命歌曲。后来，毛主席知道了，把他收藏的几张唱片送给了广播电台。

一九三九年初，新华社和《新中华报》机构虽已分开，但都住在延安杨家岭。开始时我还是兼管两个机构的业务。不久，李初梨同志调来负责报纸的工作，我就专管新华社了。一九四一年五月，根据中央决定，《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合并，改出《解放日报》。新华社与《解放日报》社一起搬到清凉山新打的窑洞里。这时，新华社的规模扩大，人员增多，工作也日益繁重。同年六月二十二日，苏德战争爆发，国际新闻更加重要，同志们日以继夜地工作，虽然十分辛苦，但大家的精神却很奋发。到年底（十二月），我离开新华社，到中央党校学习。

屈指算来，我在通讯社工作整六年。由红中社而新华社，知道新华社事业的创建与发展，是碰到过许多困难的。由于党中央的关怀和新华社全体同志的艰苦奋斗，前进途中的困难，被一个一个克服了。新华社成为党中央指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斗争

的一个重要武器，成为交流各抗日根据地建设情况和经验的有力工具。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日根据地建立初期，由于遭受到敌人的包围封锁，通讯器材极端缺乏，根本谈不上向外面购买，只能取之于敌人。可是，部队从敌人那里缴获的一些通讯器材，自己也要使用。即使如此，党中央还是从十分紧张的军用电台中，抽调或指定若干电台，作为发展新华社业务之用。口语广播台的建立，则是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依靠军队的技术力量，从摸索中装配起来的。虽然当时电力很小，器材又缺乏，播发时常因发生故障而中断，但毕竟是在不断克服困难中，逐步建立和发展了自己的业务。所以，当时每条新闻的一言一语，都是极为珍贵的。同志们知道，一言一语都是为了有助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发展和胜利。

党中央不仅关怀新华社创立的物质条件，而且对于它的新闻业务的指导，也是非常关心的。当国际国内发生重大事件时，新华社抄收的各国通讯社的新闻，事先均经中央负责同志阅览。尤其是毛主席，常常亲自关心新华社的业务。对一些重大事件的认识及其可能的发展，不仅常有批示，有时还当面指示处理的方法。这对于新华社掌握当前政治斗争的方向和洞察事物的能力，实收巨大的教益。新华社所以能担负起党报的一部分评论工作，也是在党中央密切指导下进行的。对于当时国内外重大事件的评论，绝大部分是中央负责同志亲自执笔的。大家都知道，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就是毛主席亲自写的，中共中央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也是经过毛主席几次修改的。

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新华社工作人员的工作是非常艰苦的，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十小时以上，无所谓星期日休息的制度。大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如何迅速地把新华社的业务开展起来，做好党的宣传工作。大家同当时的机关、部队人员一样，开荒生产，与

困难作斗争。锄头和笔杆，是他们进行斗争的两种重要武器。尤其是处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新华分社的同志们，不仅要学会宣传战线上斗争的本领，而且要学会对敌作武装斗争的本领；不但会写文章，还要会打仗。他们往往白天打游击，晚上编写消息，自己背着油印机和笔墨纸张，辗转战斗于敌后，直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在通讯器材和技术力量非常缺乏的当时，新华社的工作有力地配合了当时国内外重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斗争，起到了党的喉舌和推动人民进行政治斗争的重大作用。同时，也为以后新华社的发展培养出了一批骨干力量。

回顾新华社的历史，它是随着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而发展的。作为新华社的一个老同志，我希望新华通讯社更迅速而准确地反映和发布国内外一切重大事件，满足全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广泛要求，以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促进国际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祝新华社的业务繁荣昌盛，希望它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新闻通讯社。

原编者注：本文原载《新闻业务》月刊一九五七年第五期。这次重新发表时，我们特请向仲华同志的夫人杜映同志，根据向仲华同志一九八〇年谈话记录稿作了修订和补充。

（原载《新华社史料》第八期）

清 凉 山 怀 旧

吴文焘



作者简介：吴文焘，河北清苑县人，一九一三年生。一九三三年进入北京大学外文系学习，一九三七年毕业后于同年十一月到陕北，在安吴堡青训班学习。一九三八年初到延安，入陕北公学。五月参加马列学院第一期学习。一九三八年七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八年底至一九四一年夏，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先后任干事、行政秘书。一九四一年七月调解放日报社，任编辑。一九四一年十一月调新华通讯社，任副社长，主持新华社的日常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于一九四五年十月率领解放日报社、新华社先遣队离开延安赴东北。一九四六年二月任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社长。一九四七年夏赴布拉格，开辟新华社的对外事业。一九四八年任新华社第一个驻外分社——布拉格分社社长。建国以后，历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外文出版社社长，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一九八二年离休。

每从照片上看到陪伴延安城的那座宝塔，我便想起同它隔河相望，却往往不在画面的一带峰峦，那就是延河之滨的清凉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新华通讯社总社的所在地。

一九四一年秋初的一个晴朗的下午，我背上自己的全部行

装，从中央宣传部的驻地蓝家坪，到五里外的清凉山去工作。刚爬上崖角高处的一块小场地，已是大汗淋漓了。我喘喘气，正想打听，就见《解放日报》总编辑、原中宣部我的老上级杨松（吴绍镒）同志从一孔窑洞里走出来接待我，随即把我分配在这个创刊不久的报纸第一版当编辑。当一九四二年他积劳病危时，陆定一同志被派来社，继任总编辑职。

约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下旬，《解放日报》社长博古（秦邦宪）同志把我叫到他的窑洞去，告诉我：新华通讯社社长向仲华同志要上前方了，所遗社长职务，中央决定博古同志兼起来，并叫我去做副社长，主持那里的日常工作。没等我讲完自己的意见，他已察觉到我自知缺乏经验，有些畏难情绪，便鼓励我下决心克服困难，并和同志们一起，努力使新华社成为解放区的新闻总汇，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党中央要根据咱们收来的新闻电讯决定政策的。可不要再发生‘两个’大西洋宪章的现象啦！”说罢，他还通知我第二天到山头东侧新华社的一孔大窑洞，去参加欢送向仲华同志的座谈会。

从“两个”大西洋宪章说起

所谓大西洋宪章，是指一九四一年八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邱吉尔在大西洋上公布的那个政策声明。由于新华社发给《解放日报》刊登的该声明内容，有些明显的破绽，与重庆《新华日报》稿出入甚大，几乎成了两个不同的文件，引起了读者的怀疑，“两个”大西洋宪章的说法就是这样产生的。

在第二天的欢送会上，向仲华同志讲了新华社已往十年的艰苦历程，也指出当前的任务是把国内外电讯抄好、译好、编好、播好，首先要排除象大西洋宪章那样重要资料的错漏。他是

中央苏区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最早的工作人员之一，经长征到陕北，直到一九三七年红中社改名新华通讯社，又站在通讯社的负责岗位上。对于他的调离，同志们无不表示惜别之意。

到会的来宾中，有当时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诤和三局一处处长刘寅同志。他们都是红军时代我党我军无线电报事业的开创人。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第一次苏区代表大会在瑞金开幕那天，红中社使用从敌军手里缴来的机器开始广播，并将抄收的国民党中央社新闻油印出来，发给代表们作参考，这天就成了红中社、亦即新华社的生日。通讯社的电务工作，主要是王诤和刘寅同志他们承担的。以后，他们一直为通讯社培养电务人员，筹划器材设备。他们在新华社建社史上的业绩，是值得大家称道的。

王诤同志那天穿了一件缴获的日本黄呢军大衣，戴一顶没帽徽的呢军帽，说起话来诚恳直爽，引人入胜。当会后我和他一同去新闻台视察时，但见三三两两、生气勃勃的青年围拢来，向他行军礼。这个说：“局长啊，再给发两部四灯机吧！我们的收报机实在太不够了！”那个说：“报告首长，我们的电池该换了，怎么办？”当时，我们的电讯器材确实非常贫乏简陋，主要靠前方缴获，或借周恩来同志从国民党统治区回延安的机会带进一些来，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王诤同志还是斩钉截铁地回答说：“给你们，有办法！可你们得把电报收好啊！”大家听了，有的鼓掌，有的高兴得跳起来。

从那次开始，我便很快同这批日夜轮班、埋头在收发报机旁的同志们熟识起来。他们共约四十人，组织在电务科的分社联络台和新闻台两个单位里，占当时总社人数的一半以上。他们大都是从敌占区或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初中、高小学生。在通讯学校学会收发电报的技术，就来社参加了工作。除分社联络台和中央社电报使用明码，日本同盟社使用罗马字日文外，新闻台所收的苏联塔斯